

美国历史上反犹太主义的宗教文化根源

石涵月

内容提要 反犹太主义在欧洲基督教世界是一种普遍性的反对犹太人及犹太教的历史现象。反犹太主义运动也一直伴随着犹太人的美国移民史。美国作为一个以基督教为主导的国家,它所秉承的基督教文化传统无疑对其国内反犹太主义运动起了首要的推动作用,为反犹太主义的孳生和高涨提供了适宜的土壤。探讨这一问题,对于认识和把握多元民族国家中的文化冲突与整合,对于加强族群间的和解与合作、消除种族主义和偏狭的宗教情结,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基督教 反犹太主义 美国 犹太人 宗教文化传统

反犹太主义在欧洲历史上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反对犹太人的社会文化现象。可以说它是人类历史上所有仇恨中持续时间最长、散布范围最广、结局最惨的一种以一个民族为对象的仇恨。从1654年起,欧洲犹太人为躲避迫害,陆续、分批来到当时还是荷属殖民地的美国寻求新生活。但是,反犹太主义的阴影也一直伴随着犹太人的美国移民史。以当今犹太人在美国所取得的成就和社会地位,往往使人们容易忽视这一问题甚至对此产生疑问。然而反犹太主义在美国历史上不仅一直存在,从19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时期还曾出现过两次反犹太主义高潮。只是反犹太主义在美国历史上时隐时现,随着社会矛盾的变化而变化,不是美国社会的主流,没有泛滥成欧洲历史上犹太人所遭受的那种灭顶之灾。美国历史上之所以会出现反犹太主义,有着各种各样复杂的因素。对于美国的反犹太主义问题,我国学者至今还没有展开过全面性的专题研究。邓蜀生先生的《美国犹太人同化进程初探》一文,最早涉及到美国反犹太主义的历史,并对之做了简要论述;李爱慧的《东欧犹太移民与美国反犹太主义的激化》一文,侧重从东欧犹太移民史的角度谈美国反犹太主义被激化的史实。笔者将对美国反犹太主义问题的诸种因素,作专文论述,意在抛砖引玉。本文主要针对其中首要的因素,即西方基督教反犹太主义的宗教文化传统,对美国反犹太主义的影响加以分析。

反犹太主义在西方历史上作为一种持久的历史文化现象,从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帝国奴

参见徐新:《反犹太主义解析》,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6月,第2页。

参见 Leonard Dinnerstein, *Anti-Semitism in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reface.

参见邓蜀生:《美国犹太人同化进程初探》,载《世界历史》,1989年第2期。

参见李爱慧:《东欧犹太移民与美国反犹太主义的激化》,载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编:《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5月。

役犹太人、强迫犹太人希腊化但遭到反抗而开始推行反犹主义起，一直在欧洲延续了 2000 多年，影响遍及基督教国家。

基督教为什么要反犹呢？在基督教与犹太人的冲突中，起着根本性和关键性作用的首先是基督教与犹太教的神学冲突。基督教反犹主义通常是指“反犹太教”(Anti-Judaism)。“反犹太教”一词在 19 世纪末被伯纳德·拉扎尔(Bernard Lazare)使用，专指基督徒对犹太教和犹太人长达数世纪之久的宗教敌对，以区别于 19 世纪以来种族和政治意义上的现代“反犹太主义”(Anti-Semitism)。

基督教反犹的传统根深蒂固。基督教作为脱胎于犹太教又有异于犹太教的宗教，在它诞生之初，为了压倒犹太教，表明自身教义的优越，争取更多人的支持和加入，编造了一系列肆意诋毁犹太教和攻击不愿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的言论。而且这些言论被不断补入《圣经·新约》，作为一种永恒的价值观念融入基督教的教义、神学观念和传统之中，成为日后出现的歧视、反对犹太人与犹太教的一系列反犹主义行动的理论基础和指南。随着基督教与西方文化的融合，基督教的神学观念逐渐演化为西方社会的文化观念和文化传统。例如基督教关于耶稣受难的传说，认为耶稣十二门徒之一的犹大因见利忘义而出卖了耶稣基督，于是“犹太人必须为耶稣之死负责”就为广大基督徒埋下了仇视犹太人的神圣种子。尽管后来有学者经过考证，认为《福音书》为造了耶稣之死的情况，甚至指出其中有 27 处与犹太律法不相符合，然而《圣经》是神圣的，是不能改动的。基督教的某些重要事典在西方文化中往往还以节日的形式被固定下来，如“圣诞节”、“复活节”等等，这也影响着人们对犹太人的看法。

最让基督徒不能容忍的是，犹太人竟然自诩为上帝的“特选子民”。按照《圣经·旧约》的说法，上帝在万民中独选了犹太人作为自己的“特选子民”。犹太人的这种优越感加深了其与基督徒的隔阂。犹太人又非常虔诚地固守自己的宗教信仰，拒绝改宗，即使有些人为了生存而被迫改宗，但其中绝大多数人私下里还是信仰犹太教，犹太教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仍然不可动摇。犹太人的生活习俗也与基督徒不同，难以与基督教世界融为一体。这些都使基督教世界对犹太人仇恨有加。

西方早期社会对犹太人所从事的职业还有种种限制，例如，犹太人作为外民，不能拥有土地；中世纪的行会之行规很严格，也排斥犹太人。因此，犹太人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的极少。而犹太人作为一个主要定居在城市的民族，从事商业的比较多；加上基督教禁止基督徒放高利贷，于是犹太人充当放贷者的就相对较多。这样，“犹太人是经济的攫取者”，就成为基督教世界对犹太人的又一种普遍偏见。莎士比亚笔下的犹太放贷人“夏洛克”的形象在欧洲可谓家喻户晓，影响深远，在许多基督徒的心目中“夏洛克”一词几乎就等同于犹太人。

中世纪，流落到欧洲各地的犹太人作为一个寄居民族所遭受的苦难是不言而喻的，在欧洲不少国家，驱犹、屠犹事件时有发生，在不到 1000 年的时间里，犹太人从西欧逃到东欧，又从东欧逃到西欧。1096 年到 1270 年十字军东征期间，欧洲国家对犹太人的迫害达到了顶峰，一些宗教狂热分子肆意掠夺犹太人的财产并杀害犹太教徒。犹太人得以在欧洲各地居住还被视为一种恩准、一种特权，犹太人总要答应特殊的纳税额、缴纳数额可观的金钱才能获得居住一定

参见徐新：《论反犹太主义的开端》，载《同济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 年 5 月，第 6 卷第 1 期。

参见 Gavin I Langmuir, *History, Religion and Anti-Semitism*,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 275.

参见 Joseph L. Blau, *Modern Varieties of Judaism*, 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6, p. 2.

期限的特许状,而且有些统治者还把驱逐犹太人、剥夺其财产或者先将犹太人驱逐走、再抬高税额把他们招回来作为敛财的一种手段。犹太民族在欧洲各国遭受歧视、迫害的表现形式还有:必须佩带耻辱性标记,如黄腰带、尖皮帽、黄布条等,以区别于“高等”的本国基督徒居民;必须集体居住在狭小的、给犹太人划定的特殊区域“隔都”(ghetto)里。同时,无端的诽谤也时常伴随着犹太人,例如对犹太人从事“宿主亵渎”、“血祭诽谤”、“投毒播病”等类的指控一直层出不穷,而每一次指控都会导致对犹太人的残酷迫害、驱逐甚至屠杀。

在基督教文化的综合情境中,“犹太人”被等同于“恶”并被作为“恶”的象征而呈现于基督教世界的社会文化结构中。当基督教社会遇到威胁而又不能理解或解释时,犹太人就on被当作邪恶的化身、永远的外乡人和基督教社会的蛀虫。欧洲主流社会文化是基督教文化,而基督教文化传统就不信任犹太人,所以犹太人不可能真正成为欧洲主流社会的一部分。正如犹太复国主义理论家平斯克所言:“对于活着的人,犹太人是死去的人;对于当地人,他们是异己和流浪者;对于有资产的人,他们是乞丐;对于穷人,他们是剥削者和百万富翁;对于爱国者,他们是没有祖国的人;对于社会各阶层的人,他们是令人厌恶的竞争者。”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法西斯分子修建的集中营、焚尸炉更成为犹太人悲惨命运的写照,纳粹德国在二战中屠杀了600万犹太人,占欧洲犹太人的1/2,世界犹太人的1/3。究其原因很复杂,但基督教反犹的传统无疑是其中重要的因素之一。德国法西斯分子所犯的罪行已遭到世界舆论的一致谴责。

二

美国虽然自称是外来者的天堂,但它基本上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仍然强调基督教的文化传统。自殖民地时代始,美国曾长期是基督新教一统天下。在其发表《独立宣言》时,美国人中有80%是新教徒,天主教徒占总人口的0.8%,信仰基督教(包括各教派)的人占美国总人口的绝对多数;而犹太教徒仅占总人口的0.1%。随着欧洲基督徒的大量到来,美国信仰基督教

隔都:把城市中的一条街或一个街区隔离开来作为强迫犹太人居住的法定区域。“隔都”最早起源于意大利,当时在威尼斯市铸造枪炮的工厂周围划出一个街区,强迫该市的犹太人居住其中。居住区四周筑有大墙以将其与城市其他部分隔开,出入口派有基督徒看守。对这种隔离区,人们冠之以“犹太隔都”。随后,人们便习惯将所有由政府当局开辟的犹太人居住区称为“犹太隔都”。“隔都”(ghetto)一词尽管与意大利语中的“铸造厂”(geto)有关,但一般认为它来源于希伯来语“隔离”(ghet)一词。它形象地表明了犹太人在政治、社会及文化生活诸方面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与非犹太人社会的交流渠道遭到堵塞的历史现实。参见徐新、凌继尧:《犹太百科全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修订版,第651页。

“宿主”是基督教主要礼仪之一—圣餐礼上食用的一种面饼。基督教变体论认为,圣餐礼上所采用的饼和酒在礼仪过程中发生质变,救世主耶稣存在于圣餐礼中,弥撒上使用的面饼是耶稣身体寄于其中的“宿主”。因此,“宿主”被基督徒视为圣饼。所谓“宿主亵渎”,指基督徒中的反犹分子声称,犹太人怀着对耶稣的刻骨仇恨,用行贿、偷劫等手段获得圣饼,借用犹太人特有的巫术道法并采取种种令人发指的手段亵渎圣饼,以再一次折磨和杀害耶稣。所谓“血祭诽谤”,是基督徒中的反犹分子诬陷犹太人出于宗教目的,特别是为了获得在逾越节和其他犹太教礼仪上所必须的血水,秘密谋杀非犹太人,尤其以基督教男童为谋杀对象。事实上,犹太教明文禁止以血祭祖祭神等,犹太教的饮食法也禁止食用带血的肉类,更不容许食血。“投毒播病”是中世纪欧洲黑死病流行时基督徒中的反犹分子对犹太人的无端诬陷。犹太人由于有重视个人卫生和公共卫生的传统,在饮食上也有严格要求,尊重医生的传统使犹太人从医的比例很高,该民族的医疗保健水平相应也较高,加之犹太人与基督徒接触很少,交叉感染的机会也就大大减少,因而在瘟疫流行时死亡率低于基督徒,由此却遭到基督徒中反犹分子的嫉恨和中伤。参见徐新所著《反犹主义析》的相关章节。

参见刘洪一:《犹太文化要义》,商务印书馆,2004年7月,第116页。

Walter Laqueur, *A History of Zionism*,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2, p. 72

参见 Peter L. Berger, *The Capitalist Spirit Toward a Religious Ethic of Wealth Creation*, San Francisco, 1990, p. 84.

的人口更加庞大,绝大多数欧洲白人移民的宗教信仰就成了决定美国民族文化价值取向的关键。新教徒不仅在美国总人口中占绝对优势,而且成为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精英群体中的主流,代表了多数工商业、企业的所有者和管理者。在被载入 1931年“美国名人录”的 16000位名人中,有 10500人为新教徒,天主教徒只有 750人。精英们的思想和价值观,无论是宗教的、经济的,还是社会的,所建立的表达方式——有时是一种扭曲的时尚——都在引导着中、下阶层的民众。1933年,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T·艾贝尔提出“美国政府的理念和原则以及美国的社会生活都是来自于基督新教并由基督新教所支撑的”,这种思想在许多美国人心目中根深蒂固。

当美洲殖民地的建立者(荷兰人、英国人、苏格兰-爱尔兰人、德国人、法国人和其他欧洲人)移民到美国时,把欧洲反犹太主义的历史传统也移植到了“新大陆”。在新殖民地,人们在蛮荒之地努力建立文明的需要与从欧洲带来的“遗产”结合起来,发展出新的传统。反犹太主义作为从欧洲国家来的一批批基督徒的“文化包袱”被带到了“新世界”,冲淡了美国相对而言比较宽容、民主、宗教平等的社会气氛。经过一两代人后,美国“新世界”的观念就与欧洲反犹太主义的价值观混合在了一起,反犹太主义成为美国文化一个真正的和不光彩的组成部分。反犹太主义就像一种基因疾病,被一代一代遗传;又像是一个民间传说,被添加、传播,以适应特殊的时代、地方和环境。它在基督教社会存在了两千年,它的表现形式根据历史环境而改变。无论这种“疾病”在何时何地出现,犹太人是“谋杀耶稣的凶手”、“经济的攫取者”、“永远的叛徒”、“基督教文明的颠覆者”、“魔鬼的化身”等等,都被用来作为“发病”的借口。

19世纪后期是美国工业化、城市化大发展的社会转型期,工业化的浪潮吸引着无数移民涌向美国寻求致富的机遇,从而引发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移民潮。到 20世纪 20年代美国“移民限额法”颁布为止,这一时期来到美国的移民达到 2000多万人,其中犹太人有 200多万人。这些移民主要来自东、南欧地区,他们分别信奉天主教、东正教和犹太教。于是,美国新教徒在人数上的绝对优势逐渐下降,新教在美国一统天下的地位开始被打破。这一情况引发了美国土生白人和新教徒的恐慌。怀有强烈宗教偏见的新教徒“害怕外来移民中具有不同信仰的教徒和欧洲思想激进分子会在美国煽动和制造‘骚乱’,从而破坏美国原有的‘社会团结’”,就把从东、南欧地区来的移民视为对新教和美国共和制度的一种严重威胁,因而对新移民的宗教信仰百般诋毁和排斥,特别是基督教反犹太的传统使其对犹太人的歧视和排斥更为严重。

因为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均源于基督教,所以来自东、南欧地区的移民中的天主教徒、东正教徒与美国新教徒一样,都拥有基督教反犹太的宗教文化传统,对犹太人有天然敌对的宗教情绪,他们也加入到美国反犹太主义的行列中。而犹太人千百年来勤勉奋斗、重视教育的传统使其子女受教育的程度远高于其他移民,也高于美国本土人,于是犹太人在美国的日益崛起使新教

参见董小川:《美国宗教民族主义的历史省察》,载《史学集刊》,2002年第 2期。

参见 Leonard Dinnerstein, *Anti-Semitism in America*, preface.

参见董小川:《美国宗教民族主义的历史省察》,载《史学集刊》,2002年第 2期。

参见 Rufus Lears, *The Jews in America*, Cleveland, the World Publishing Co., 1954, p. 289.

参见 Leonard Dinnerstein, *Anti-Semitism in America*, p. 3.

同上,第 245页。

同上,前言。

梁茂信:《美国移民政策研究》之《序》(丁则民所作),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10月,第 2页。

徒、天主教徒、东正教徒仇恨不已。“犹太人一直生活在偏见之中,很少有基督徒不曾轻视过亚伯拉罕的子孙。传教士从来没有停止过强行要求犹太人改宗,以拯救他们的灵魂,同时灭绝犹太教。”

在 20 世纪初期,美国人关于犹太人的看法,是建立在早期基督教对犹太人的敌对描述之上的,并且对之加以发挥。“犹太人控制着美国的商业”、“犹太人引起经济衰退”等观念,尤其是夏洛克式的陈词滥调,在 19 世纪末期就已经很明显了。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第一次反犹主义高潮时期,犹太人是“美国经济的攫取者”、“破坏美国人血统的贱民”、“国家的颠覆性的因素”等观念甚嚣尘上,犹太人因而在美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遭到强烈的攻击。

20 世纪初,美国国内的排犹现象很严重。破坏者不止在一个城市用枪向犹太会堂扫射,针对犹太人的纵火与爆炸并不鲜见,墙壁上有反犹太的涂鸦,在全美各地的犹太墓地有数百座墓碑被推倒;美国有不少反犹组织,其成员印刷并分发反犹太人的文学作品、报纸,某些反犹主义的报纸印刷精美、价格不菲,一看就知道背后有富裕的赞助商。在日常生活层面上,同过去那些招工告示曾写明专要“新教徒”以排斥爱尔兰人一样,此时则写明只要“基督徒”;在医学界也出现了对犹太医生(特别是牙医和精神病医生)规定限额的要求;房地产主制定公约:“希伯来的后裔免开尊口”;在美国约半数的州里,根据基督教传统的“礼拜日法律”将“礼拜日不得营业”的规定强加在犹太店主身上;度假旅馆拒绝犹太人入住的问题依然很严重;美国一些著名社会团体曾在 19 世纪 90 年代拒绝接受犹太人,这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成了普遍现象,不少社交俱乐部、互助会和兄弟会都拒绝犹太人加入;国民警卫队和一些艺术学会、住宅区也把犹太人排斥在外;授予军官官职时犹太人也遭到歧视;1922 年,哈佛大学校长阿伯特·劳伦斯·洛维尔宣布他将限制犹太学生的数量,公开做大部分常春藤联盟大学私下里所做的事情,此后许多名校以种种方式限制犹太学生的数量,美国一些著名高等学府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还对犹太学生规定限额。

基督教反犹主义的传统经过美国第一次反犹主义高潮的大肆渲染和强化,成为美国根深蒂固的社会观念,为美国 20 世纪 30 年代再度爆发的反犹主义高潮打下了广泛的社会基础。20 世纪 30、40 年代,随着经济危机和二战难民潮的发生,以及美国本土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美国又爆发了第二次反犹主义高潮,犹太人成为众矢之的,遭到全社会的攻击。美国第二次反犹主义高潮对犹太人造成的伤害比第一次更甚。

“在 1915—1932 年间,美国建立的反犹组织有 5 个,1933 年就建立起了 9 个反犹组织,1934—1939 年的 5 年间,反犹组织竟发展到了 105 个,这还不包括西部和中西部较小城市的排犹组织。”经济大衰退的 10 年催生了从以农村和小城镇为基础的“银衫党”到以城市为中心的“基督教阵线”等范围广泛的反犹主义组织。“据估计,在大萧条的那十年中,美国可能有

美 雅各·瑞德·马库斯著,杨波、宋立宏、徐娅因译,徐新校:《美国犹太人 1585—1990 年:一部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年 6 月,第 118 页。

参见 美 雅各·瑞德·马库斯著,杨波、宋立宏、徐娅因译,徐新校:《美国犹太人 1585—1990 年:一部历史》,第 240 页。

参见 美 托马斯·索威尔著,沈宗美译:《美国种族简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第 106 页。

参见邓蜀生:《世代悲欢“美国梦”——美国的移民历程及种族矛盾(1607—200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年 6 月,第 342 页。

参见 美 雅各·瑞德·马库斯著,杨波、宋立宏、徐娅因译,徐新校:《美国犹太人 1585—1990 年:一部历史》,第 118、119、121 页。

邓蜀生:《美国犹太人同化进程初探》,载《世界历史》,1989 年第 2 期,第 32 页。

1. 5万名隶属于各反犹主义组织的坚定的犹太憎恨者。”

20世纪30年代,对犹太人的攻击无止无休。美国参、众两院的议员以及主张美国不参加二战的人、保守派人士、宗教顽固派、反黑人者和民众鼓动家都提高嗓门,攻击犹太人。在1929年到1941年这段经济大萧条时期,反犹偏见大行其道。美国需要一只替罪羊,而犹太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要求扮演这个角色。

美国社会上的排犹思潮影响了政府的决策,在二战前和二战期间造成了美国政府对欧洲犹太人危险境遇的冷漠。20世纪30年代末期,欧洲地区的数百万犹太人处于德国纳粹的铁蹄之下。当犹太难民为逃避纳粹的迫害而纷纷逃离欧洲时,美国则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犹太难民实行了排斥性的政策。1939年,满载犹太难民的“圣路易斯”号客轮驶入纽约港湾,满怀希望的犹太难民们激动地看着海岸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和川流不息的车辆,渴望尽快上岸开始新的生活,然而经过与美国移民局官员交涉后,却被拒绝上岸。走投无路的犹太难民们不得不离去,结果在返回欧洲的途中“圣路易斯”号客轮被德国潜艇击沉,所有难民无一人生还。

美国在这一时期制定了严格的关于移民限额的制度,使大批战争难民望而却步。二战期间,美国只收容了2.1万名犹太人,而本来它可以收容更多的犹太人以帮助他们脱离苦海。当时在社会上十分普遍的反移民态度和反犹太主义的影响下,有70%—85%的美国人反对政府放宽移民签证限额来帮助犹太难民。当时,对于纳粹屠杀犹太人,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美国新闻媒体都没有进行报道,基督教会、政界、知识界对此也都保持沉默。美国政府在1941年以前始终没有颁布重大政策来拯救犹太难民。美国在二战中对待各国难民的态度,尤其是对待犹太难民的表现,在历史上留下了很不光彩的一页。

美国历史上的两次反犹主义高潮,当然是由于美国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促发了反犹太主义的高涨,但是,作为一个以基督教为主导的国家,美国所秉承的基督教反犹太主义的宗教文化传统无疑在其中起了首要的推动作用,从宗教文化角度为美国的反犹太主义推波助澜。基督教反犹太主义的文化传统,为美国反犹太主义的孳生和高涨提供了适宜的土壤,成为美国社会反犹太主义运动中在较长时段发挥作用的历史因素。

三

美国历史上的两次反犹主义高潮,一次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犹太人在美国社会生活中如升学、就业、居住、法律公正等各个方面都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和沉重打击;另一次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犹太人成为众矢之的,成为美国社会经济危机的替罪羊。当然,与欧洲历史上的反犹太主义相比,这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然而,这也是一个不得不关注的问题,因为美国犹太人问题和反犹太主义问题不仅是美国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犹太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而且,美国反犹太主义与欧洲反犹太主义的异同也是值得进一步深究的学术课题。

当今世界,区域性冲突不断,民族、种族、宗教冲突激烈,开展反犹太主义研究,不仅在于让人们不要忘记历史上犹太人所遭受的苦难,还涉及到如何防止这种苦难在别的民族身上重演的

美 雅各·瑞德·马库斯著,杨波、宋立宏、徐娅函译,徐新校:《美国犹太人 1585—1990年:一部历史》,第240页。

参见美 雅各·瑞德·马库斯著,杨波、宋立宏、徐娅函译,徐新校:《美国犹太人 1585—1990年:一部历史》,第241页。

参见梁茂信:《美国移民政策研究》,第310页。

参见邓蜀生:《世代悲欢“美国梦”——美国的移民历程及种族矛盾(1607—2000)》,第344页。

问题。对反犹主义进行深入研究,还关系到人类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理性发展的重大问题,对民族、种族的歧视,不同宗教、文化的冲突,是世界上所有的文明与文化都必须面对和正视的现实问题。

二战后,反犹主义逐渐从美国退潮,这有多方面原因。一是由于世界舆论对纳粹罪行的揭露和谴责,使反犹主义的行径在美国也遭到冷遇。二是美国本土的现实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三是犹太人在美国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中成就日益显著,地位举足轻重。四是美国民主力量的增强,尤其是1964年美国全面的公民权利法案的通过,针对不同信仰群体和少数民族群体的各种法律歧视开始减弱,美国政府在某种程度上也鼓励和支持各种民间组织为消除国内偏见行为而开展的活动。

如今,美国的民族、种族、宗教的成分和比例都在发生变化,美国历史上的反犹主义以及反犹事件无论是对美国公众还是对专业人士来说,都是被淹没在民族大融合与文化多元化的“祥和”气氛中的话题。对美国这样一个“大拼盘”抑或“大熔炉”的国家来说,研究其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件及其背后所蕴藏的民族与宗教文化心理,对于我们认识和把握多元民族国家中的文化冲突与整合问题显然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美国既是种族多样化的国家,也是存在着不少种族社会问题的国家,种族偏见至今还有市场,并未根除,例如对黑人、华裔等的歧视和排斥现象依然存在。

因此,记取历史的教训,加强族群间的和解与合作,消除种族主义和偏狭的宗教情结,无疑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Abstract Anti-semitism was a common historical phenomenon in the European Christian world which was against the Jews and Judaism, however, it accompanied the Jewish immigration history to the US. With Christianity the leading religion in the country, the US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Christian traditions which inevitably promoted the nationwide anti-semitism movement, and thus nurtured a seedbed for the birth and growth of anti-semitism. A probe into the origin of anti-semitism has profound realistic meanings concerning the acknowledgement and control of cultural conflicts and integrations within a multinational country, enhancement of conciliations and cooperations among ethnic groups, elimination of racialism and narrow religious complex.

(石涵月, 讲师, 延安大学人文社科学院, 延安, 716000)

(责任编辑: 丁克定)